

# 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皆为后人假托说

曹文柱

蜀汉丞相诸葛亮当年隐居躬耕的地点，究竟在今河南南阳的卧龙岗？还是在今湖北襄樊市郊的隆中？长期以来，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两种意见之中，南阳说穿凿附会，漏洞百出，很难成立。比较而言，持今隆中地说者的理由则充分一些，但它在若干关键之处，又有重蹈郢书燕说之弊，因此不仅不能使对方服膺，甚至无法作到自圆其说。《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中李兴所撰的《诸葛丞相故宅碣表》，是隆中说最重要的论据。然表文叙述诸葛亮故宅的地理位置为“沔之阳”，恰与今隆中地的方位不合。于是，有人辩解说，这里的“阳”可以指水北，也可指水南。对于现代襄樊人是否有水南也可称“阳”的习惯，笔者不太清楚。但在中国古代，水之阳乃为水北的专称，晋人李兴也只能是这个认识。兹举西晋以前的史料证之：《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其注曰：“日之所照曰阳，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说文解字》卷14释与“阳”字相对的“阴”字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还有人作此句是指李兴上司荆州刺史刘弘受朝廷之命，来汉水以北讨伐张昌的解释。然而这一说法又与《碣表》上下文文意乖舛，不易讲通。至于那种汉水曾改道说，因未有任何史料可证，更属想象成分太重的假设。其实，隆中说的大部分立论是有道理的，诸葛躬耕原址确实未出今襄樊辖区，只不过它不在今天的隆中，而是位于襄樊西北的汉水北岸地域，即后汉沔水之北的邓县境内。今南阳、襄樊两处的诸葛躬耕遗址都不可信，皆属后人的假托。

为什么会出现南北两处伪址，真迹反而被掩盖的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是长期历史演变的结果，是随着不同时期人们对诸葛躬耕遗址的了解程度以及关心程度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

如果按历史时期划分，人们对躬耕遗址的认识大概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 （一）三国时期，人们对诸葛亮躬耕之地的情况所知不多。

从现存最原始的三国资料（《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来看，涉及躬耕地具体地点的内容，除《出师表》中的“躬耕于南阳”一句外，几乎是个空白。何以会有这一现象？笔者倾向于一些力主南阳说同志的观点。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荆州以外地区的知名度并不高。虽然在他的周围已形成了一个由当时名士构成的团体，似乎诸葛亮还居于核心地位，象庞德公、司马徽、徐庶、崔州平、孟公威诸人都很器重或推崇他，但一直未引起求贤若渴的曹操、孙权们的注意，甚至连他叔父旧友刘表也对其不感兴趣。之间原因与诸葛亮早年淡泊宁静、慎重择主的志向不无关系。在《出师表》中，他讲出山前后的心态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谕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本传注引《魏略》又

称：“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正由于他心存大志，不急于功名，不愿鼓吹声张，所以了解他本领的人不多，名气不大，知道他躬耕地的人也有限。诸葛亮投入刘备阵营后，随着赤壁大捷及不断地建功立业，声望大为提高，但他生性谨慎，为家眷的安全，仍不愿泄露躬耕地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襄阳以北的荆州地区已被曹魏占领，这种因素更为突出。几十年后，诸葛亮全家在成都安顿已久，他才在《出师表》中透露出曾“躬耕于南阳”的信息。一方面，诸葛亮讲的确是实情，因为邓县自秦以来直到后汉末年都属南阳郡管辖；另一方面则因南阳是帝乡，即汉光武帝的老家，且又与“固多奇士”的汝南、颍川两郡齐名，是个人才荟萃之地，以兴隆汉室为己任的诸葛亮自称客居这里，心境颇为复杂。

## （二）两晋时期，沔水以北的隆中地区已被人们确认为是诸葛躬耕遗址。

前文提到的《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所提供的材料，对于研究诸葛躬耕遗址，价值最大。现将《蜀记》的部分内容修录如下：“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弑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歿，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今我来思，覲尔故墟。……”史文明载，这次祭奠活动是在沔水之北进行的。刘弘等人不但瞻仰了诸葛亮的故宅，而且还登上了隆山，这说明当时的隆中、诸葛故宅都在沔北。刘弘奉皇帝之命凭吊孔明，责任重大，绝不会将遗址搞错，尤其是他还带着个熟悉情况的蜀人李兴。李兴，益州犍为人。其父李密曾作陈情表，不愿入仕晋室。史载，李密、李兴父子都对故国前相诸葛亮的为人十分崇拜。出于这种经历和特殊感情，李兴自然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对诸葛亮熟悉，很可能搜集和掌握了不少诸葛亮生平的资料。李兴参与的这次诸葛故宅碣表，张冠李戴的可能性极小。

东晋时期，史学家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讲：“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对诸葛故宅、隆中地理方位在邓县境内的明确标定。习凿齿是襄阳人，一向推崇诸葛亮。在给友人恒秘的书信中，他曾讲自己由襄阳“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乃至“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晋书·习凿齿传》）。《初学记》卷24中保存有他写的《诸葛武侯宅铭》。铭文极力歌颂诸葛亮的丰功伟绩，“义范苍生，道格时雍”，还对孔明当年在隆中的生活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自昔爰止，于焉盘桓。躬耕西亩，永啸东恋。迹逸中林，神凝岩端。罔窥其奥，谁测欺欢？堂堂伟匠，婉翻扬朝。”此外，习凿齿又在《襄阳记》中讲：“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广五丈，曰葛井。堂前三间屋地，基址极高，云是避暑台。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甫吟》，因名此为乐山。嗣有董家居此宅，衰殄灭亡，后人不敢复憩焉”（《诸葛亮集》卷5《遗迹篇》）。总之，习凿齿所提供的材料与李兴铭文可互为补充，证明诸葛躬耕地原址在沔水之北的邓县境内。习凿齿对诸葛故宅情况相当熟悉，并亲自到实地作过考查，因而他所标定的遗址方位无可怀疑。

持今隆中地说者为弥补这一漏洞，列举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襄阳县条：

“万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从而得出邓县境土横跨沔水的结论。根据历史地理的大量资料证明，古人行政区域的划分往往依照山脉河流的自然走向而定，何况《图志》只讲地势标帜最鲜明的靠近沔水的万山，是襄阳县与邓县的分界处，并未作出邓县境土在水南的任何明示。就连明万历《襄阳府志》也承认，“万山以西，汉水以北为南阳邓县所辖。”而南阳郡与南郡的最早切割，恰是以沔水为界的。《汉书补注·地理志》南郡条引习凿齿《襄阳记》曰：“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南为南郡。”《路史·国名记》卷4引萧梁任昉《地记》云：“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者是。”沔水从山都到襄阳有百余里为东西走向，水南水北分郡即指这段河流而言，邓县恰在其间。从秦到唐，邓县曾有过多次的改属、易名，但是在两汉时期它一直属南阳郡管辖，就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分割南阳和南郡，邓县的归属也没有改变。属于南阳郡的邓县绝不可能跨水据有两郡之地。退一步讲，即使邓县境土有跨水的可能，今隆中地在襄阳的西南方，与习凿齿所言的西部不合。上引《元和郡县图志》同条下文还有“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则为古隆中地在沔水之北添一力证。

### （三）南北朝时期，人们对诸葛亮躬耕遗址印象模糊，位置开始移至水南。

南北朝时期，襄阳一带的沔水两岸处于进退东南或西北的咽喉地带，是南北政权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在习凿齿的晚年，襄阳即被前秦攻陷，此后东晋与北方政权展开拉锯战。直到东晋末年轻刘裕北伐，这里才重归南方，邓县始与襄阳同属侨治雍州。《宋书·州郡志》雍州京兆太守条讲其下辖三县，其一为“邓县令，汉旧县，属南阳。”到南齐永泰元年（498）北魏南下攻齐，“沔北诸郡为虏所侵，相继败没”（《南齐书·明帝纪》）。当时邓县是主要的战场。《资治通鉴》卷141永泰元年条讲，“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萧衍大败于邓城。”胡三省在此文下注曰：“邓县，汉属南阳郡；宋大明末，割襄阳西界为京兆郡，邓县属焉。其地在隋襄阳郡安养县界。唐贞元中，又改安养县为邓城县。今邓城县在襄阳城北二十里，隔沔水。”永泰后邓县沦为魏土。中大通五年（533），魏梁在雍州重新开战，“于是沔北疆为丘墟”（《通鉴》卷156）。二十年后，西魏攻破江陵，俘获梁元帝萧绎，这一带生民又遭涂炭。由于战争频繁，文化遗存破坏很大，诸葛亮躬耕遗址势必在劫难逃。正是在孔明故宅屡遇破坏，旧貌很难寻觅之时，人们才开始将其附会到沔水之南的。如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29沔水条下云：“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谕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昭明文选》卷37《出师表》注引南朝后期人所著《荆州图副》曰：“邓县旧县西南一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

为什么人们要将诸葛亮躬耕遗址附会到水南？原因很简单，沔南的风景远胜于沔北，特别是今隆中地区条件更佳。明代弘治年间襄王朱见淑曾因“慕隆中山佳奇，择为埜地”（《襄阳府志·襄康王崇慰先贤书》），而将诸葛庙破坏，人们觉得只有这样“龙蟠山水秀”的胜地才符合诸葛亮的身分和性格。诸葛亮故宅的南移，是后人将它理想化了。

但在遗址南移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沔南的所谓隆中在汉代不属南阳，而属南郡，不好解释。有人试图对此加以调和，象刘宋人刘敬叔在《异苑》中就讲：“武侯躬耕于南阳。南阳是襄阳墟名，非南阳郡也。”这纯属无视史实的随意发挥。

### （四）隋唐两宋时期，很多人承认躬耕遗址在襄阳，但又无法摆脱对南阳的印象。

诸葛亮智慧忠贞、勤勉克己的品德受到后人的尊敬，也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在诸

葛亮留下足迹的地方陆续有祠庙落成，并经常举行祭祀活动。从唐代以来，“鼓吹青林下，时闻祭武侯”（唐·李频《送友人入蜀》）的现象相当普遍。襄阳一带诸葛亮庙的出现大约起于唐代。前引明《襄康王崇慰先贤书》曰：“隆中亮庙，历唐宋元皆知崇奉。”《襄阳金石略》卷8载有“蜀丞相武乡忠武侯诸葛公碑”的碑目，下引《舆地纪胜》曰：“（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李景逊撰，今在隆中。”复引《复斋碑录》称：“李景逊撰，正书无名氏篆额，大中三年建。”此碑后有孙樵的题记，文存于《唐文粹》卷55中。《金石略》还载有“唐改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庙记”碑目。此碑也曾立于襄阳一带，时在唐昭宗光化二年（900）间。宋人真德秀讲，嘉定三年（1210）荆襄制置使刘光祖“在襄修孔明故宅，表羊杜遗迹；凡此可以兴化正俗者无不为之”（《西山集》卷43《刘阁学墓志铭》）。这些都是唐宋人在襄阳一带修建诸葛遗迹纪念物的凭证。

襄阳一带的诸葛躬耕遗址，实际上已为不少唐宋人所接受。古籍中有大量唐宋诗人游隆中歌颂诸葛亮的诗篇。比较有名的有唐人崔道融的《过隆中》：“玄德苍黄起卧龙，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怜蜀国关张后，不见商量徐庶功。”宋人苏轼的《隆中》：“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胜悲。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空余蜿蜒迹，使我寒涕垂。”但唐宋人立庙的“隆中”，似乎尚未移至今隆中地，大约仍在沔水沿岸附近。前引李吉甫的《图志》明言诸葛亮故宅在襄阳西北；苏轼又有“万山诗”，也云：“回头西北望，隐隐龟背起。云是古隆中，万树桑柘美。”唐代曾对邓县进行改制，此后“与襄阳俱属襄州”（《襄阳府志·沿革考》）。因此苏轼诗既云隆中在万山西北，又讲在“襄阳野”，并不矛盾。但行政区划的变动，也致使一些对历史不加深究的人，将诸葛亮误视为襄阳人。如唐僧人景霄在《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中称，“孔明即诸葛亮之字也，襄阳人也。”那则是另一回事了。

由于诸葛亮自称躬耕地在南阳，故而也有人北上南阳的郡治宛城去祭奠这位历史名人，搜寻他生活过的遗迹，同样有大量诗篇留世。如唐人汪遵的《南阳》：“陆困泥蟠未适从，岂妨耕稼隐高踪。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以及唐人胡曾的《南阳咏史诗》：“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主出草庐。”大约在宋末元初阶段，南阳人已开始为诸葛建祠，与襄阳一带的庙宇区别在于，它们只是些“巫覡杂糅”的民间小庙，并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五）自元代起，南阳正式建祠祭祀诸葛亮，规模渐与襄阳等同，呈现并驾齐驱的局面。

随着诸葛亮的被神化和历史地位的提高，南阳人为争地望，自元代起，在取得了封建政府承认后，正式建祠立庙，并陆续仿造了各种遗址。元人程巨夫在《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中，详细地记载了南阳在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到仁宗延佑年间（1314—1320），修建诸葛庙、孔子庙和诸葛书院的始末。现择其有关部分选录如下：“南阳城西五里，有冈阜然隆起，曰卧龙冈；有井渊然淳深，曰诸葛井者，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祠之，巫覡杂糅，荐献无节，黷礼慢贤，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何玮行农至郡，率官吏长老伏谒祠下，顾瞻徘徊，忼然兴怀，……出步祠东，得隙地焉，曰：是足以建庙学矣。……上于省以闻，报可。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广焉。祠之东为孔子庙，庙之后为学。凡堂序门庑，庖廐庖庾，肆业之斋，度书之阁，官守之舍咸备。屋以间计，祠有十二，

庙学四十有六，端庄广直，不务侈丽。皇庆元年秋落成。割官废地四十顷，籍于学，置山长一人，掌其教，讫功且再岁矣。”南阳诸葛庙的全部完工是在延佑四年。从动工到落成，乃至最后命名、立碑纪事都是在皇帝同意下进行的。明初洪武年间，诸葛亮被朝廷指定为从祀的历代名臣之一，南阳府奉敕重修武侯祠。据明人王直的《重修武侯祠记》记载，仁宗年间又有修祠活动。“洪熙元年（1425）五月，太守陈君正伦，始至谒而周视祠宇，萧然不蔽风雨。……乃于农隙，伐材命工，撤而新之，以八月二十八日告祠以落其成。”此后这类的修复工作史不绝书。关于宣德、成化、弘治、嘉靖年间的几次修葺活动，在李东阳的《重修诸葛武侯祠记》和牛凤的《改正诸葛武侯祠记》里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在历代修建南阳武侯祠的过程中，各种仿造遗迹陆续出现。如弘治年间（1488—1505）曾对诸葛草庐精心营造：“鸠工市材，为堂六楹，中肖侯像，左右庑楹亦如之。其后为亭，履以茅，扁曰‘草庐’。庐之后，又为堂六楹，曰‘卧龙’”（以上碑记皆引自《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461）。

在南阳建造诸葛遗迹的同时，今隆中地也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建成了附会躬耕地的“隆中十景”。但不久，它们即惨遭重大破坏。弘治年间，襄王朱见淑毁草庐等建筑为自己构造陵寝，遂“将诸葛亮祠迁于山之左臂，地既非宜，庙且陋小”（《襄康王崇慰先贤书》），很快墙倾壁圯了。其后虽然明武宗又恩准在隆中东山再造新祠，继而世宗复令臣下进行维修，但这里始终未能恢复旧观，反而落在南阳之下。今隆中诸葛躬耕遗址系列建筑群主要是在康熙年间几次扩建整修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陨襄观察使赵承恩主持的那次，不但整修了明祠，而且恢复了三顾堂、野云亭、草庐亭、抱膝亭等景观。到光绪年间（1875—1908），人们又在山麓建造了一座以“古隆中”题额的大青石牌坊。至此，南阳、襄樊两地的诸葛躬耕遗址建置规模不相上下，呈现出并驾齐驱的局面。

对比两地遗址，南阳处不但晚出，而且毫无道理，然而其势咄咄逼人。可惜今隆中地南偏原址，留下了为南阳人不服气的把柄，终于弄成个“何必辩襄阳、南阳”的一场糊涂官司。

## 《高等学校管理》(修改版)出版

本书是“六·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曾于198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几十所高校和教育部培训中心试用，反应良好。1988年又进行反复讨论修改，于1989年11月出版。

作者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从办好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要求及教育体制改革的精神出发，根据我国的国情，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高等学校管理的实际工作经验，揭示高校管理的一般规律、原理和方法。全书共分十二章，论述高校管理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组织管理、计划管理、信息管理、目标以及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教学、科研、体育、卫生、人事、教学科研设施、总务、财务管理等各项工作，内容全面系统，实用性强。是一部全面系统的高校管理专著。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培训中心等广大干部、教师和教育管理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学校管理学教学的参考书。